

圣经研究与西方文论建构

梁 工

(河南大学圣经文学研究所教授,475001 开封,中国)

摘要:考察西方文论与圣经研究的相互关系,能发现圣经研究为西方文论的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具体表现为:圣经研究孕育出某些文论,圣经研究为某些文论的成长提供了营养,一些释经规范转型为诗学原则,圣经研究施惠于文艺批评方法,圣经研究为检验新兴文论提供了试金石。

关键词:圣经研究、西方文论、释经规范、诗学原则、批评方法

作者:梁工,河南大学圣经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开封市,河南省。电子邮箱:hdlianggong@263.net

自圣经成书之日起,在长约两千年的西方文化史上,文学与释经学、文学理论与释经学理论始终同时并存,既相互渗透又彼此推动,这一特点在 20 世纪表现得特别显著。一般说来,文学理论是文学批评的产物,然而它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也会得到来自其他渠道的滋养。考察西方文论与圣经研究的关系,能发现历代文论尤其当代多元文论的成长受到过古今圣经研究的有力促进;换言之,圣经研究为西方文学理论的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圣经研究孕育出某些文论

20 世纪形形色色的文化和文学理论与圣经研究均有错综复杂的关联性,其中关联度最高的当属哲学阐释学和神话-原型批评,二者皆由圣经研究孕育而成。

当代哲学阐释学的理论殿堂建构于文本阐释学的根基之上,文本阐释学则大体上发端于犹太教和基督教对圣经的阐释,或谓圣经阐释学。自圣经成书时代起,亚里思托布鲁斯、斐洛、亚基巴、希勒尔、沙迈、迈蒙尼德等历代犹太释经家,使徒保罗、伊里奈乌、德尔图良、克莱蒙、奥利金、尤西比乌斯、亚大纳西、安布罗斯、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埃克哈特、伊拉斯谟、马丁·路德、加尔文等历代基督教释经家,就对释经学的发展和完善做出持续不断的贡献。施莱尔马赫从释经学中引申出一般阐释学,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保罗·利科等人进而提升出哲学阐释学,使之成为带有普遍意义的当代文化哲学理论。继之,哲学阐释学为姚斯和伊瑟尔在接受美学、斯坦利·费希的读者反应批评,以及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提供了思想资源,又对 20 世纪人文学科的所有领域均发生某种程度的影响。

神话-原型批评的首要理论家是加拿大学者诺思洛普·弗莱,他固然从弗雷泽、荣格那里汲取了某些文化资源,他对神话原型理论的主要贡献(见于其代表作《批评的剖析》、《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等)却基于圣经研究。由于两大原因,其学术生涯与圣经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是基督教

家庭语境的熏陶,二是英国诗人布莱克的影响。他坦言其学术活动无不围绕着圣经进行:“从一定意义上说,我所有的文学批评著作,从1947年发表的对布莱克的研究开始,到十年后完成的《批评的剖析》,都是围绕着圣经的。”^①弗莱不满于历史考据学肢解圣经以求从文本细小单元中发掘历史元素的机械做法,而主张将全部圣经视为一个宏大整体,亦将古今文学视为一个整体,以便着眼于全局把握对象;在他看来,圣经神话原型在整体性的文学世界中发挥了某种贯通古今的结构功能。他在《神力的语言》中剖析了“高山”、“花园”、“洞穴”、“熔炉”四种原型模式,认为它们均植根于圣经,又移位变形于后世西方文学的各类作品中。

二、圣经研究为文论的成长提供营养

盛行于当代的心理学-精神分析文论、女性主义文论、后殖民文论、生态批评文论等皆从圣经研究中得到滋养。

心理学-精神分析文论是在多方面汲取前代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富含圣经-基督教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圣经擅长展示人们追求口腹声色之乐的心理,如福音书中的耶稣被称为“贪食好酒的人”;^②使徒书信谓保罗认可男欢女乐的性欲:“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③其中对人类精神现象的细致观察成为心理学文论可资研讨的原初材料。弗洛伊德和荣格皆熟谙圣经,并从中撷取所需的素材,如荣格在精神病患者的梦中发现一种“四位一体”原型,为了证实其普遍意义而从圣经中检索依据:伊甸园中流淌着四条河;以西结的异象中有四个活物;活物各有四张脸、四个翅膀、四个轮子。荣格甚至主张用“四位一体”取代正宗教义的三位一体,提出“正统的基督教信条不完整,因为恶的原则(the evil principle)未见于其中,而是作为魔鬼撒旦独立笨拙地存在着”。^④他引用一位天主教权威人士之言“撒旦的存在只能从与三位一体的关联中去理解”相佐证,断言“对魔鬼的任何神学处理如果游离于上帝三位一体的意识,都是对其实际位置的篡改”。^⑤

就圣经研究对女性主义文论的哺育而言,早在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第一次浪潮中,斯丹顿就出版秉持女性主义立场的《妇女圣经》(1895),该书成为日后女性主义文论的理论基石。圣经学者既用“质疑的诠释学”搜索圣经所载妇女的负面资料,如妇女受凌辱、被歪曲、遭轻视的事例,对经文予以批判性分析;也用“修正的诠释学”恢复和重建圣经传统中有关妇女的正面内容,聆听被淹没的女性声音、重构圣经中的女性主题,并发掘上帝形象的母性元素等。这方面的分析直接汇入女性主义文论,成为其两大基本命题——颠覆男权中心文化、维护女性权益和地位——赖以建构的重要资源。

圣经研究对东方学乃至后殖民文论也发生过不可或缺的滋养作用。后殖民文论的奠基作是萨义德的《东方学》(1978),仅从该书就能看出,历史上的圣经研究对东方学甚至后殖民文论的兴起立下过显著的推动之功。概观之,在欧洲人心目中,“东方”的最初含义就是“圣经所述之地”;“东方学”作为一种不断累积的集体合作事业,与包括圣经研究在内的西方学术传统有着水乳交融的关联

^① 弗莱,诺思洛普 Fulai, Nositluogu [Frye, Northrop] :《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Weida de Daima——Shengling yu Wenxue* [*Great Code: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郝振益 Hao Zhenyi、樊振国 Fan Zhenguo、何成洲 He Chengzhou 译(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学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1998),4。

^② 《路加福音》*Lujia Fuyin* [Luke] 7:34。

^③ 《哥林多前书》*Geлиндuo Qianshu* [1 Corinthians] 7:9。

^④ 荣格 Rong Ge [Jung, C. G.] :《荣格文集》*Rong Ge Wenji*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冯川 Feng Chuan 译(北京 Beijing: 改革出版社 Gaiqiang Chubanshe [Reformation Press],1997),363。

^⑤ 同上书,363。

性；在东方学的发展过程中，近代圣经考据评判学为之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甚至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圣经中丰富多彩的典故和形象早已融会于东方文化的血脉中，成为进行东方研究时无法回避的元素；人们可以肯定、否定或有所分析地对待圣经，却不能无视它、排除它或绕开它；东方学的不断发展意味着学术界对“东方”的认识日益远离了圣经说教，尽管一些欧洲学者迄今仍难以摆脱圣经的古训。

当代生态文论的勃兴也从圣经批评中深受其益。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基督徒学者林恩·怀特就撰写论文，断言圣经对生态危机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论文获得美国生态学会颁发的米斯(Mercer)奖，引起犹太教和基督教学者旷日持久的争论。一批思想开放的自由派人士支持其见解，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工业革命以来这个地球上的生态危机日益加重，造成触目惊心的后果，圣经作为深刻影响后世的文化元典，对此严重态势的形成难辞其咎。^⑥亦有人主张客观冷静地钻研古代遗产，认定圣经传统中富含生态平衡意识和环境保护观念，可为当今的生态事业所运用。无论何种看法，都激起研究者对生态问题的重视，从源头上推动了生态运动的进展，促进了生态文论的建设。

三、释经规范转型为诗学原则

从斐洛、奥利金到中世纪主流诠释传统，古典释经学最具特色的运作规范当为“寓意释经法”，典范形态是中世纪的“四重意义说”，即圣经语句皆有字面的、譬喻的、道德的、寓言的四重意义，“字面”传达约定俗成的书面意义（或谓历史意义），“譬喻”告诉人们应信之事，“道德”规范人们应做之事，“寓言”则显示基督徒所盼望之事。据此，经文中的“耶路撒冷”便有了如下四种内涵：在字面上指位于巴勒斯坦的一座山城，就譬喻而言特指教会，在道德上喻指人的精神与灵魂，就寓言而论又指向天国之城。

中世纪末期意大利诗人但丁将这种“四重意义说”引入诗学，提出著名的“诗为寓言论”：诗或文学皆有寓言性质，亦具备字面的、譬喻的、道德的、寓言的四重含义，其中后三种属于“神秘意义”，是诗或文学的精华之所在。他以圣经诗句“以色列人出了埃及，/ 雅各家族逃离说异言之民，/ 那时犹太为主的圣所，/ 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⑦为例，具体分析道：

假如就字面意义而论，出现于我们面前的只是以色列人的子孙在摩西时代离开埃及这件事；可是如果作为譬喻看，它就表现基督替我们所做的赎罪；如果就道德意义论，我们看到的就是灵魂从罪恶的苦难到天恩圣境的转变；如果作为寓言看，那就意味着从腐朽的奴役状态转向永恒的光荣的自由。虽然这些神秘意义都有各自的特殊名称，但总起来都可以叫作寓意，因为它们同字面的历史的意义不同。^⑧

但丁宣称其《神曲》如同圣经一样寓有微言大义，就字面意义论不外乎“亡灵的境遇”，但若就隐喻义解，则是说“人们在运用其自由选择的意志时，由于善行或恶行，终将得到善报或恶报”。^⑨

但丁的“诗为寓言论”开创了西方近现代文论的“意在言外”诗学传统，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克罗齐的表现主义，爱伦坡对“神圣美”的追求，波德莱尔的“感应系统”理论，以及马拉

^⑥ Kay, Jeanne. "Concepts of Nature in the Hebrew Bible", *Environmental Ethics* 10. 4 (1988): 309-327.

^⑦ 《诗篇》Shi Pian [Psalms] 114: 1-2.

^⑧ 伍蠡甫 Wu Lifu 主编：《西方文论史，上卷》*Xifang Wenlun Shi, Shangjuan* [A History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vol. 1] (上海 Shanghai: 译文出版社 Yiyen Chubanshe [Translation Press], 1979), 159.

^⑨ 同上书, 159.

美、瓦莱里、叶芝、庞德的象征主义诗论等，便是这一传统的若干表现样式。直觉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把艺术家和欣赏者的主观心灵放到首位，重视情感，推崇形式，以矫枉过正的态度反对艺术对社会生活的直线式反映和简单摹仿；“突出艺术家的特点和艺术的内在规律，严格划分它与自然科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界限，张扬天才、个性、灵感和艺术的特殊功能，甚至将其提高到与生命、本体、人生态度和宇宙世界观相联系的地位”。^⑩在该派文论家看来，世界的本质不在于直观可见的此岸经验世界，而在于充满奥秘意义的彼岸精神世界，但此岸与彼岸之间存在着内在感应关系，诗人的任务就是运用象征、暗示等手法揭示那种关系，赋予人生和世界以意义。由于“言有尽而意无穷”，他们无不注重以精雕细刻的语言表达内心的独特体验和感受，运用象征手段暗示隐秘的心灵世界，以及深藏于表象世界背后的“纯粹精神本质”。

这类文论与释经学中的“寓意解经法”有着显见的相通之处，二者都追求超越文本的字面含义而进入一个精神性国度。但二者又有某些不同：直觉主义、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固然在某些层面涉及宗教信仰，其表达的大体上仍是诗人的心灵世界；寓意解经法致力于从经文的字里行间开掘出隐秘寓意来，则要最终服务于对宗教信仰的张扬和传播。

四、圣经研究施惠于文艺批评方法

一些例证表明，圣经研究还为当代文艺批评方法的创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弗洛伊德的论文《米开朗琪罗的摩西》(1914)堪称一个方法论范例，示意研究者能如何将精神分析运用于文艺批评。在弗洛伊德看来，米开朗琪罗塑造了一个情感服从于神圣使命的摩西形象，刻画出一个超越了自我的非凡人格。艺术品是艺术家观念、意图、情感活动的外部表现，目的在于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从这种思路出发，弗洛伊德细致地解释了摩西塑像的形体特征，以求揭示隐藏于其间的艺术家的无意识冲动，找出那尊塑像所具备的宣泄情感、净化心灵功能的内在理据。他赞成克纳克弗斯的论断“摩西所产生效果的巨大秘密，在于他的内部激情与外部平静的冲突”，^⑪据此剖析道，摩西塑像从上到下展示出三个不同的心理层面：脸部线条表达出处于优势的情感，那是理性原则或“超我”的体现；形体中部显示出被压抑行为的痕迹，表明当事者的冲动正在被现实性原则或“自我”所束缚；腿和脚依然保持着准备行动的姿态，暗示出其潜在本能或“本我”的冲动。摩西内心的张力还从其两只手表现出来：一只手温和地放在膝上，抚弄着天然垂落的胡须末端，仿佛正以其超我的理智抵御着狂怒的激情；另一只手则“在片刻之前狠狠抓住了胡须”，^⑫那种下意识行为似乎是一种本我冲动的瞬间爆发。他的整个肌体虽处于内心振荡和外表面平和的紧张关系中，其整体造型却显示出抵制后的平静。这些论证表明，弗洛伊德正是基于对圣经的深刻理解及其对圣经人物心理的深度把握，才可能将精神分析学说成功地推及文艺理论，为精神分析文论及其方法论的建构所借用。

一批女性主义学者如特丽波、非奥伦查、米克·巴尔等擅长运用多种手段富于创意地解析圣经，既将女性主义文论提升到更高的哲学层面，亦有效地丰富和充实了它的方法论。且以特丽波的“非父权化”和“性别修辞”阐释法为例。所谓“非父权化”阐释，是指对经文做出迥异于父权化解读的阐

^⑩ 马新国 Ma Xingguo 主编：《西方文论史》Xifang Wenlun Shi [A History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北京 Beijing: 高等教育出版社 Gaodeng Jiaoyu Chubanshe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2), 317。

^⑪ 弗洛伊德 Fuluoyide [Freud, S.]：“米开朗琪罗的摩西” Mikailangqiluo de Moxi [“Moses of Michelangelo”]，《弗洛伊德论美文选》Fuluoyide Lun Mei Wenzuan [Selected Articles on Aesthetics by Freud]，张唤民等 Zhang Huanmin etc. 译(上海 Shanghai: 知识出版社 Zhishi Chubanshe [Knowledge Publishing House], 1987), 123。

^⑫ 同上书, 131。

释,或者避开父权制观念的干扰而重新理解某些圣经篇章,其哲学依据是现代神学家布尔特曼的“非神话化”阐释学思想。布尔特曼认为,在理性与科学居主导地位的现代语境中,若僵硬地恪守圣经文本中的神话表述,如马利亚感受圣灵怀孕生下耶稣,以及耶稣死后第三日复活等,势必导致现代理念与古代世界观的正面冲突,进而削弱基督教信仰的切实有效性。所以,不必拘泥于圣经文本的表层逻辑,而应将其理解为表达宗教体验的神话故事,以求抽取出文本蕴含的文化精神,服务于当下的精神文明建设。

受布尔特曼的启迪,特丽波相信圣经故事的原初形态表达了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只是那种形态被后来的父权制释经传统所遮蔽,而女性主义诠释者的使命就在于剥离后世的遮蔽,恢复文本的原初意义。伊甸园故事是传统释经家贬抑女性的重要依据,他们由夏娃断言女人是诱惑者,是罪的始作俑者,故女人应当顺从丈夫,受男人管辖。特丽波却另辟蹊径,运用“非父权化”阐释法揭示出一种消弭了性别偏见的圣经信仰,提出“*adam*(亚当)一词并不专指男人,而泛指全人类,其性别特征是“雌雄同体”。就创世顺序而言,上帝依次造出日月星辰、植物动物,随后是“*adam*”,最后是女人,这说明造女人是创造过程的最高峰;依据耶稣之言“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⑬女人理当最受推崇——由此可见,后世神学家对夏娃的责难纯属无稽之谈。

特丽波还主张对圣经文本进行“性别修辞”批评,即借鉴古希腊罗马学者对古典著作的语词考据、注释或训诂,对圣经中的某些术语予以女性主义的辨读。例如《创世记》称女人是用“亚当的肋骨”造成的,传统观念认定肋骨表示“低级”或处于从属地位;特丽波却断言,这其实是误读,因其本义仅仅是以肋骨为造出女人的质料;较之造出男人的质料尘土和气息,肋骨实际上更坚固,并不表明女人比男人低一等。

五、圣经研究为检验新兴文论提供试金石

各种层出不穷的新兴文论是否具备真理性?如何验证其内在价值和实效性?——当代文论家遇到这类问题时,不难发现,他们每每把圣经文本当作自己的演兵场或试金石。一如谢大卫对此类文论家何以介入圣经批评的判断:他们实际上并不真正关心圣经文本,并非为了深入了解圣经而钻研它;而是为了借用圣经检验自己的理论,因为圣经恐怕是“目前世界上尚存的、仍旧能够抑制被任何一种理论任意摆布的惟一文本了”。^⑭

这种“借圣经以试刀”做法枚不胜数,比如,雅各·德里达在《给予谁?(知勿知)》中围绕着亚伯拉罕祭献以撒的困境,以“令人颤栗的奥秘”(mysterium tremendum)为焦点,精深释读了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颤栗》,揭示出后现代哲学的“同一性”悖论。^⑮雅克·拉康在《“父亲的名字”研讨会引论》中聚焦于上帝的“欲望”(desire)而非其“快感”(bliss),使上帝本身进入语言秩序之中,进而运用精神分析理论重释圣经文本,对其间的权力性质予以释读。^⑯米克·巴尔强调跨学科的视界和方法,

^⑬ 《马太福音》*Matthai Fuyin* [Matthew] 18:4。

^⑭ Jeffrey, David L.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in the 1980s: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 59. 4 (1990): 577-580.

^⑮ 德里达,雅各 Delida Yago [Derrida, Jacques]: “给予谁?(知勿知)” “Geiyu Shui? (Zhi Wuzhi)” “Whom to Give to (Knowing Not to Know)”, 刘平 Liu Ping 译,《圣经文学研究》*Shengjing Wenxue Yanjiu* 第3辑 [Biblical Literature Studies, vol. 3] (北京 Beijing: 人民文学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9), 132-170。

^⑯ 拉康,雅克 Lakang, Yake [Lacan, Jacques]: “父亲的名字研讨会引论” “Fuzhi de Mingzi Yantaohui Yinlun” [“Introduction to the Names-of-the-Father Seminar”], 黄汉平等 Huang Hanping etc. 译,《圣经文学研究》*Shengjing Wenxue Yanjiu* 第3辑 [Biblical Literature Studies, vol. 3] (北京 Beijing: 人民文学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9), 171-193。

注重揭示不同学科的若干作品表现同一对象时的互释作用,她在《用作书写策略的身体》中以包括圣经在内的三种文本和一种图像为例,综合剖析了图文之间的再现关系,“将结构主义朝着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潮与思想潮敞开”。^①

罗兰·巴尔特、保罗·利科一类理论家涉足于圣经研究时,与通常的师生也迥然不同,巴尔特的《结构分析与圣经阐释:解读文集》便以圣经阐释为手段,来论证结构主义具有消解边界的功能。^②巴尔特早年作为结构主义理论家,曾致力于寻求叙事文本表层话语背后的深层结构,进而认识叙事性作品共同的内在规律,其方法与普罗普和格雷马斯的形式分析异曲同工。但他后来却拒绝高度模式化,而采纳了相对主观化或非科学化的态度。在解读巴尔扎克小说《萨拉辛》的著作《S/Z》中,以五种代码(阐释代码、意素代码、象征代码、情节代码、文化代码)切割文本,为发掘出文本的多元意义找到方便易行的操作步骤。为了证实其运作方式的有效性,他又在《〈使徒行传〉第10-11章的叙事结构分析》中罗列出该文本中的叙事代码、地学代码、专有名词代码、历史代码、意素代码、修辞学代码、行动位代码、时序代码、接触代码、象征意义代码、奥秘学代码和元语言代码,以示那个片段乃是由各类可能的代码组合成的,它们表面上似乎构成一个意义连贯的系统,其实不过是一些能指碎片的集合。因而“对此文本的发问”固然是为了“建立一种一般叙事语言结构”,但却“面临着讨论此唯一性文本的必要”。^③任何文本都是“唯一的”,它可能兼备的“一般叙事语言结构”只拥有较次要的意义——正是基于这种见解,巴尔特最终超越了传统的结构主义而抵达后结构主义。

从巴尔特对圣经故事“雅各与天使摔跤”的分析中能看出他尝试超越传统结构主义时的足迹。他认为,雅各击败天使的结局呈现出“逻辑的突然性”:“兼具知识、秘密、特殊击法之人,却被击败了。换言之,序列本身尽管完全是行动性的、完全是传奇性的,其作用却是使格斗双方失去平衡,不仅是通过一方对另一方的意外胜利,而且尤其是通过此胜利的非逻辑的、颠倒的特征。”^④这就难免导致读者对文本意义的多元化解读,甚至是相互抵触的理解,从而无法对文本的内在结构达成共识。巴尔特以此迈出突破结构主义思维定势的重要一步,认同了文本寓有多重意义的可能性。他“实际上并未把文本规约为任何一种可能的所指(历史的、经济的、民间故事的或者宣教的),而是维持着其意义的开放性”。^⑤

刘意青论及后现代文学理论呈现出多元化格局的意义时指出:“这种多元化不仅使20世纪中后期的学术达到空前繁荣活跃,也使文学文本显得那么多姿多彩,含义无穷。承认文本解读的多种可能和意识形态的多元权威,能促进世界文化和政治的多元化运动,使中心和权威受到挑战,使少数群

^① 巴尔,米克 Bar, Mike [Bal, Mieke]; “用作书写策略的身体” “Yongzuo Shuxie Cefu de Shenti” “Body Politic”, 张思齐 Zhang Siqi 译,《圣经文学研究》Shengjing Wenzue Yanjiu 第3辑 [Biblical Literature Studies, vol. 3] (北京 Beijing: 人民文学出版社 Renmin Wenzue Chubans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9), 194-225。

^② 刘意青 Liu Yiqing; 《圣经的文学阐释——理论与实践》Shengjing de Wenzue Chanshi——Lilun yu Shijian [The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学出版社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3。

^③ 巴尔特,罗兰 Barthe, Roland [Barthes, Roland]; “叙事结构分析——关于〈使徒行传〉第10-11章的分析” “Xushi Jiegou Fenxi——Guanyu <shituxingzhuan> di 10-11zhang de Fenxi” [“An Analysis on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Acts 10-11”], 《符号学历险》Fuhaoxue Lixian [L' aventure Sémiologique], 李幼燕 Li Youzhen 译(北京 Beijing: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China Peoples' University Press, 2008), 181-206。

^④ 巴尔特,罗兰 Barthe, Roland [Barthes, Roland]; “与天使摔跤——〈创世记〉32:22-32的文本分析” “Yu Tianshi Shuaijiao——〈Chuangshiji〉32:22-32 de Wenben Fenxi” [“An Analysis on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Jacob Wrestled with the Angel’ (Genesis 32:23-33)”], 《符号学历险》Fuhaoxue Lixian [L' aventure Sémiologique], 李幼燕 Li Youzhen 译(北京 Beijing: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China Peoples' University Press, 2008), 212-214。

^⑤ 同上书, 219。

体和族类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争取到自身的权利。”^①其间多元化文学理论与圣经批评彼此影响、相生互动,这一进程业已大大拓宽了人们观察文学理论的视野,并将促使文学理论的发展更趋成熟和繁荣。

^① 同 14,16-17。

English Title:

Biblical Studi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LIANG Gong

Professor and Ph. D. Supervisor of the Institute on Biblical Literature Studies of Henan University. 475001, Kaifeng, China.
Email: hlianggong@263.net

Abstract: When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biblical studies, one can find that biblical studies had don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which embodies in, biblical studies give birth to some literary theories, biblical studies provide nourishment for the growth of some literary theories, some criterions of hermeneutics had been transformed as poetics models, biblical studies bestowed upon methods of literary criticism, biblical studies supply touchstone for inspecting new literary theories.

Key terms: biblical studies;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criterions of hermeneutics; poetics models; methods of criticism

